



第 二 期

鄞縣新四軍研究會會刊

譚石龍

鄞縣新四軍研究會編

一九九三年五月

〔抗战烽火〕

- 郑 挥 殷湾乡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
- 毛斌丰 三支队初建乌岩抗日根据地 (3)
- 钱继祖 我是怎样保存抗币和新四军臂章的 (2)
- 鲁 刚 米店老板娘——钱珂芹 (5)
- 王元兴 真正优势在人民这一边 (10)
- 肖 林
- 冯可法 忆抗日斗争二三事 (12)
- 徐友祥 寻找三五支队 (15)
- 蔡之奇 参加革命第一站——大陆商场 (20)
- 周保泉 挺进苏浙地区的点滴回忆 (16)
- 翁绍初 “两分红”运动 (17)
- 魏长法 虎口夺粮 (18)

〔山岗红旗〕

- 杨祥瑞 记坚持鄞西斗争若干片段 (21)
- 毛晓甫 公馆颂 (28)
- 项 耿 惊鄞奉“突变公馆” (29)
- 章群英 从学生到游击队员 (30)

〔资料〕

- 张完成 新四军和浙东游击纵队简介 (32)

〔简讯〕

- 本会召开第二次理事会议 (37)
- 会员杨兴如创办经济实体 (37)
- 会员活动 (37)
- 省批准鄞县为革命老根据地县 (38)

殷湾乡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郑 挥

1937年我七岁，在上海澄衷中小学读书，“七七”抗战爆发，“八一三”日本侵略者发动了淞沪之战，松井石根所部集中了卅万大军，数百架飞机和大炮，几十艘军舰，狂轰滥炸达三个月。我军民以血肉之躯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死伤以千计，其壮烈在民族抵御外侮历史上，鲜有前例。

我们全家一起逃难，回到了故乡东钱湖畔殷家湾，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对入侵者的仇恨。逃难回乡，我进了鄞县县立小学读书。由于战争的影响，师生猛增：校址在殷湾村湖中心，往返用一木船摆渡。校长姓王，他的妻子毛先生是我们班级的老师，据称是鄞县教育科科长之妹。学校里有一位教高年级的老师张沧海先生，他是共产党员，知识广博而且习武，耍棍棒很有功夫。圆脸剃平头，中等身材，和蔼可亲，并善于团结和联络校内外知识青年。他宣讲日寇入侵惨无人道，国仇家恨，使我们这班青少年热血沸腾，深受影响。

1938年，在张沧海先生的组织领导下，殷湾建立了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民先队的主要是知识青年和中学生。我大哥郑慕贤（郑济良）是民先队队长。

“南京惨案”鬼子屠杀我几十万同胞，血流成河，消息传来，殷湾人民义愤填膺。在张先生的领导下，组织了大游行，同学们与全体民众高举抗日标语，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为死难将士报

仇”！“为死难同胞报仇”！“血债血还”！从殷湾小街直抵莫枝镇，再回旋到白石山下。沿途回乡知青、农民、渔民纷纷加入游行队伍，其激情和悲壮，记忆犹新。在郑氏宗祠广场上，学校以及来自上海的抗日宣传队曾数次搭台演出抗日救国活报剧、话剧、歌咏等等。广场上、石凳上、栏杆上都挤满了人群，湖边“大对船”、“乌蓬船”上也都有观众。我参加了童声大合唱，在活报剧中演孤儿。在宗祠内还曾举行过抗日救国漫画展览，有学校师生和回乡知青的作品。在张沧海先生的组织下，村民和同学们在平满山上挖了环形战壕，至今爬上山腰尚可见到残迹。同时建立了一支民兵武装，有几支步枪，在宗祠前操练；形势紧张时在白石山顶放警戒，观察宁波方向之敌情，用旗语传讯。一时搞得轰轰烈烈，开始了国共合作时期的抗战高潮。张老师的活动是半公开的，后来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方面开始干预，校长王××是国民党员，勾结乡长郑和孚及其它劣绅对进步知青和学生进行了恫吓。他们挨家挨户对家长进行要挟：“张沧海是共匪、共产党，你家孩子跟着他走要杀头的！”“不准同张沧海接触，否则后果自负”。一时白色恐怖笼罩殷湾。

1939年母亲去世，我们带着伤逝悲哀的沉重心情回到了孤岛时期的上海。由于张先生的教诲，启蒙教育，促使我们全家兄弟姐妹五人参加了上海党的地下活动。二姐肖虹参加了新四军三五支队。1940年郑贤慕、郑慕澄发起创办了“海藻文艺社”，出版

我是怎样保存抗币和新四军臂章的

钱继祖

抗战爆发，上海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失业回家。1941年严安区成立常备队，我即入伍。旋即上升到沙洲警卫营二连任文书、司务长，由指导员顾金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又调到18旅教导队学习。由于形势紧张，日寇在苏南实行“篱笆式”扫荡，部队奉命北渡，入南通、如东、东台等地活动，后又转入兴化县东南蒋庄、大周庄等水网地区。1942年春学习结束，回18旅，被分配到58团8连。同年秋，奉调去保卫军部，继之我连被派往黄海之滨保卫“江淮银行”印刷厂。我们夜行昼宿，经一个多月长途跋涉，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安全到达，将人员和物资转移到苏中解放区。自此，苏中解

放区军民有了自己发行的货币。从那时开始，我一直保存着一张抗币到现在。

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乘我后方留守部队兵力薄弱，夜间偷袭缴去我方所有物资和大批“新四军”臂章。为了防止敌人利用臂章假冒我军进行破坏活动，军部于1945年向全军换发“N4A”臂章，以示识别。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抗币”和“N4A”两件纪念品。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始终携带身边。当时战斗频繁，我宁将背包和其他物品丢掉，而把这两件纪念品放在内衣口袋里珍藏。它随我战淮海，渡长江，解放上海，南下福建，也和我转业到地方，珍藏至今。

文艺刊物若干期，我们全家都参加了这项工作，后来地下党的领导同志沈正光同志也来了。“海藻”团结了孤岛时期的进步作家和大批知青，培育造就了一批抗日战士和干部。

半个世纪是多么悠长的岁月，象是瞬间

即逝，象隔世，又象昨天。人间有否阴阳界，上天与地府？张沧海先生阴魂在哪里呢，魂游四海吗？几十年来一无音讯，如此静寂。

三支队初建乌岩抗日根据地

毛斌丰

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在日寇进攻面前，一触即溃。1941年4月20日，宁波城被日寇占领，继而又占领了城郊及鄞西平原集镇。散兵游勇涌进鄞西山区。我的家乡乌岩（鄞西偏僻山村）被溃兵、土匪霸占，他们与当地地痞流氓一起，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向山民敲诈勒索，奸淫掳掠，开场放赌，拐卖良家妇女，无恶不作。弄得不少山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百姓怨声载道，日夜盼望：有一支好军队，有一个好政府，为百姓除害，过个太平日子。

1942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一支几百人身穿黑色粗布的军队来到乌岩村，大家又吓得胆战心惊。但出于村民的预料，他们进村就热情地喊：“老大爷、老大娘”。不向村民要粮、要东西。解下背上的米袋，下锅煮饭。自己出钱卖柴、卖菜。给房东家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给村民户户挑满水缸水。然后在地上铺草搭铺。全村男女老少都很惊奇。但弄不清这支部队是那里来的，部队初到，为防止敌人袭击，也没有公开番号。事后知道是我们久盼的好军队。他们是共产党领导从上海浦东到宁波敌后打日本鬼子的新四军浙东纵队第三支队。

三支队住在村里，开展抗日宣传。同村民说话和气，有说有笑，问寒问暖，关心村民疾苦。几天后，大家混熟了，胆子也大了，傍晚主动围拢来与部队交谈。老人们向支队领导诉说几十年来受土匪、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恶霸欺压的苦。告诉领导：离乌岩二里山上的瞭舍村，八月来了一支由民国慈溪县

县长带领的一支混合部队，勾结当地土豪劣绅，敲诈山民，奸淫抢掠，弄得百姓日子过不下去……部队领导听了非常同情。

三支队侦察班从乌岩街上捉来一个从瞭舍下来买东西的伙夫。经过审问，了解到敌人的情况。经过教育放他回去，叫他带去一封信：要他们团结抗日。警告他们不要欺压百姓。若再骚扰、侵害百姓，则将受到惩罚，直至消灭。

三支队在乌岩住了几天，为扩大影响，开辟抗日根据地，向横街、凤岙、樟村、密岩一带进发，宣传抗日。在离开乌岩时，归还全部借的东西，损坏了的赔偿，向群众征求意见，打扫卫生。村民称赞部队纪律严明，是一支好军队。他们在鄞西各乡宣传团结抗日救国，了解民情。经过一段时间，又回到乌岩住下。这时老百姓热情欢迎，主动向部队反映敌人情况，诉说驻瞭舍杂牌军恶性不改，继续欺压百姓。

支队长林达召开干部会议，研究消灭这支残害百姓，不抗日的害民部队。

1943年1月下旬，一天晚上，住在我家的一位部队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做部队侦察瞭舍匪军向导。那年，我是一个18岁的热血青年，受到三支队同志十多天的宣传教育，政治觉悟有了提高，加上对打仗的好奇性，瞒着家里人，陪同支队领导，到瞭舍村对面森林岗老鹰岩山岗上的一山头上，观察瞭舍村敌人活动。支队领导在柴丛里用望远镜侦察敌人工事，一边观察，一边问我。我把熟悉的地形一一作了回答。他们边看边研

究进攻路线。回来后，支队领导又找来早先潜伏在瞭舍教书的地下党员叶大纲同志，请他详细介绍敌人住地，人员、装备、工事和哨位，一一在地图上作了核对。当晚作出攻打决定。

24日凌晨三点，部队集会，首长作了动员，分四路奇袭瞭舍匪军。我带80多名指战员从乌岩村庙下溪脚沿着青山茂密竹林，静悄悄斜插上瞭舍村边。另三路也在响导的带领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黎明前到达，四面包围瞭舍，象天兵天将从天而降，发起冲锋。与敌哨兵一阵猛烈交火，冲进村。不到半小时，这支睡得死死的乌合之众，被打得措手不及，100多人作了俘虏，残敌向芝林、太平地方方向逃窜，欺压山民的兵匪被赶出瞭舍。俘虏经过教育，大部遣散，少数愿留下的参加了三支队抗日。

这是三支队进入鄞西敌后抗日，为民除害的第一仗。消灭了欺压百姓的害人虫，乌岩周边老百姓过了个太平年。不少青年踊跃

参军，扩大了抗日部队。

之后，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也随三支队进驻乌岩、芝林、红岭一带领导抗日。乌岩形成了鄞慈抗日根据地中心。在三支队帮助下，乌岩成立了联保办事处（即乡政权），推选民主人士毛明川当办事处主任。在民运同志陈智毅的领导下，乌岩村办起了民众俱乐部，建立村委会、农会、妇救会、民兵自卫队、粮食合作社、打猎队和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附近各村也先后成立同样组织。我被推选为乡农会委员，领导农民减租减息，根据各村农民协会举报，镇压了几个罪大恶极、继续通敌的伪保长和地痞流氓。抗日民主政府威信大振。敌伪顽军和土匪不敢再来乌岩骚乱，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有的逃往上海、宁波和平原，留在山区的也老老实实了。山民开始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在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根据地也逐步扩大和巩固。

米店老板娘——钱珂芹

鲁 刚

编者按：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多次发动反共高潮，妄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国民党鄞县县长、宁波专员、宁警总队总指挥官俞济民，反共特别凶恶，派特务四出活动，盯梢追踪、侦查逮捕党的地下工作者，破坏地下党机关，杀害共产党员。

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开辟敌占区的抗日根据地，许多女共产党员，象保姆一样，用各种形式掩护地下党机关和党的领导干部，在一条无形的战线上坚持与敌、伪、顽开展斗争。她们的工作是平凡的，却关系着党的生存和发展，关系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

钱珂芹同志是其中之一。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两次北撤两次南下，将毕生精力献给革命事业，1992年于杭州病逝。

一九四〇年，国民党鄞县县长兼宁波公安局长俞济民。派特务四出活动，经常突击查户口，尤其对没有女眷的光杆户作为重点侦查对象。中共鄞县地下党县委，由于特务的追踪盯梢，县委开一次会，有时要转移二、三个地方。因此，党领导的抗日群众运动，地下党的生存和发展，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上海美亚四厂女工钱珂芹填好入党志愿书不久，突然被地下党组织找去谈话：“你在宁波有没有男朋友？”年轻姑娘内心害羞，支唔地答：“没有”。“不对吧！你有一个姓周的朋友，在宁波做重要的工作，他

要求你也到那里去和他一起工作”。

钱珂芹想起了几天前爱人周飞的来信。忆起童年的悲惨生活，党和周飞的启蒙教育，内心充满着欣喜和忧虑。

她原名瑞华，一九一九年出生在浙江嵊县三口村一个贫农家庭。当她还在妈妈肚子里，就受到严重的封建思想迫害。三十多岁的父亲对她妈妈说：“生下如果是女孩子，就要弄死”。她出生后，妈妈和接生大娘拉住父亲苦苦哀求，才保住了这条小小的生命。

钱珂芹父亲患哮喘病，家庭经济困难。她七岁时，父亲带她母女到肖山寻求生路。八岁进一家丝厂做童工，人小身矮机器高，她站在一条小板凳上，一天劳动十二个小时，八分钱工资，工作稍不顺资本家的心，就被工头抓辫子痛骂挨打。她哀求妈妈不去做工，妈妈先是劝哄，继而威吓：“你不去做工，在家一日打你三顿。”妈妈流着眼泪，真的忍痛打了：“娘没有法子，你不去做工，家里就要没饭吃……”为了分担家庭的困难，她答应妈妈再去上工。但是，最后，因钱珂芹织的丝被工头检查出不合格。她被打了一顿，开除出厂。

妈妈又托人介绍到一家纱厂做童工。这家厂三班制，钱珂芹年幼，有一次上夜班，累得实在熬不住了，打起瞌睡，小辫子险些被机器轧住送掉生命。

一九二九年，母亲在一家工厂烧饭，被工厂工头霸占去了。父亲气得要自杀，幸被工友发现劝阻住。父亲不能在肖山住下，带

着钱珂芹回到嵊县老家。家贫如洗，父亲又把她卖了三十五元钱，给一家开场放赌人家做童养媳。十二岁的钱珂芹，承担着这一家的家务劳动，放鹅、养猪、磨豆腐。公婆还逼她去偷农家作物，供作赌徒的点心。第二年，公公暴病死。婆婆骂她“白虎精”“扫帚星”……一天挨几次毒打。她象落了油锅、入了地狱。十五岁，婆婆病死，她偷了红绿帖，跑回家里，不幸父亲病故。又托人介绍去上海考入美亚工厂做工。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暴发，上海失守。钱珂芹逃难回家，给人养蚕、采茶、做佣人；屡受逼嫁和坏人欺侮，迷信思想又在她心中升起，悲叹命苦。在堂妹的介绍下，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嵊县县委组织部长周飞。在周飞的启发教育和接济下，认识到自己的悲惨童年，不是命生得苦，而是封建制度和国民党反动派主导的压迫和剥削。

钱珂芹又向人借了川资，回到上海，进入美亚四厂做工，她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抗日募捐活动，参加工厂夜校学习文化，讨论抗日形势，穷人为什么穷？为什么受压迫、受剥削……？

美亚四厂地下党领导同志望着沉思的钱珂芹，问：你去宁波男朋友那里工作，愿意吗？”

“服从组织需要”钱珂芹羞怯地说。她很快地收拾随身行李，告别了工友，四月来到宁波，与周飞建立家庭，负担起掩护县委机关的重任。

中共鄞县县委书记周飞、组织部长秦加林和宁绍特委组织部长竺杨，都是脱产专做地下工作的，被称职业的革命家。他们每人每月由组织发给五元津贴维持生活（包括吃、穿、住、行和交际费），生活十分艰苦，一日只能到饭摊或小饭店吃两餐最低级的饭菜。买不起牙膏、牙粉，刷牙用食盐代替。数个月或半年才洗一次澡。买不起肥皂，洗脸的毛巾又黑又黄。身上衣服生满虱

子，又肥又大，坐下吃饭或看书看报，就是伸手抓虱子，身上抓起斑斑血丝。

钱珂芹看到县委领导的艰苦生活，日夜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救亡而奔波，把自己从上海带来的积蓄，买来简单的灶具和碗筷。买米买菜，搞了个机关小食堂，改善县委领导生活，每天吃饱三餐饭，不再上饭摊过半饥不饱的生活了。给他们添置了必要的衣衫更换，买了肥皂，从老虎灶打来开水，消灭“革命虫”。每当周飞去远地开会或其他革命活动，她与邻居聊家常，建立感情，做好左邻右舍的工作。按周飞交代规定时间，没有回家，就处理好窗口的标记，使来联络的同志作好应变，保证机关和同志的安全。县委在楼上开会，她在楼下洗衣服、做饭、放哨，注意特务的活动。

三四个月之后，钱珂芹带来的积蓄全部用完了，又发生了经济恐慌。县委为了不使机关住的时间长了暴露目标，把机关从江东转移到西门外汪弄，她除了掩护机关，白天去汪弄小学为老师烧饭和做清洁卫生工作。这所学校是地下党的联络站，校长胡健是县委组织部长金如山的爱人，一个教师也是地下党员、名朱虹，另一个也是接受党领导的进步青年。钱珂芹在汪弄小学工作，每月拿五元工资，解决生活困难，又负起县委与学校联系员的任务。

不久，为了开辟鄞东区的工作，县委决定派钱珂芹去东钱湖边殷家湾的大昌布厂当工人。她在在大昌布厂工人中开展工作，与党员邱阿姣同志培养发展了四个党员，建立支部，支部书记邱阿姣（后钱珂芹）。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在殷家湾村，租了一间破旧平房，作为区委、县委的联络点。

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破坏国共合作，发动反共高潮。中共宁属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要“精干隐蔽，积蓄力量，长期埋伏，待机而动的指示”，指出面目已经暴露的党员干部，

要有计划的撤退到抗日根据地——到解放区去工作。决定周飞和钱珂芹首批撤退。一九四一年二月，钱珂芹转到鄞南前王周飞隐蔽的小学，生了孩子，由周飞把刚满月的孩子送到嵎县老家，托南庄一家老百姓寄养，然后随同周飞、周云一起往苏北进发，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

一年后，钱珂芹接到家里来信，女儿病死，同志们知道了都为她难过，她却忍着悲痛说：“少了一个累赘，我可以更专心的做革命工作”。

一九四三年初，中共中央华中局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派一批干部到浙东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钱珂芹随周飞和一批新四军干部又回到浙东，她分配到四明专署（特办）政治工作队做民运工作，在加湖、南王和慈南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

过了不久，四明地委书记陈洪把钱珂芹找去谈话，派她到鄞西建立鄞奉县委机关工作，公开的面目是开一升米店，掩护以周飞为首的县委。她听说又要做秘密工作，思想不通，向陈洪提出：“做秘密工作，对我损失太大，要求不去”。陈洪耐心对钱珂芹说：

“派你去做秘密工作，有许多重要的报告听不到，有不少会议不能参加，你做公开工作的经验和大刀阔斧的工作方法，一时也用不上了，这对你个人与工作是有很大损失的，但是党和周飞同志的工作需要你，而且又是别人代替不了的，所以，你应该服从组织的分配”。

钱珂芹感到再无理由，但是思想上还要求做公开工作，于是，又对陈洪说：“我服从组织分配，但是做惯了公开工作，到鄞西这个新环境，秘密工作叫我怎么做？”陈洪微笑着说：“你去苏北前在宁波掩护过机关，有许多经验。当然，去鄞西的秘密工作，有新的特点：鄞奉县委除了领导五、六个不公开的区委和一个直属乡支部外，还要领导一个挂名在国民党郭青白支队的林大

队。你的任务就是到鄞西梅园乡建岙村开一升米店，公开老板是周飞，实际负责人是你这位老板娘，地委派政治交通员魏梅仙做你的助手，拨二万元伪币给你作本钱”。

钱珂芹拿了地委介绍信，和魏梅仙一起到了建岙，找到周飞，魏梅仙改名钱爱琴，作为钱珂芹的堂妹妹，对外说是来米店帮忙的。周飞陪她到地下党预先准备好租来一间背山面路的楼房，这间屋楼上分前后两间，后间有一个窗口靠山，供县委开会场所，有紧急情况就可从窗口出走上山，沿山岗有山路可通往大雷等地，前间是寝室，楼下也分前后间，前间是营业的店堂，后间做厨房。

钱珂芹托人到鄞江买了箩筐，售米的升斗，两只锅子和一只脸盆等炊事用具和生活用具；并同魏梅仙到牌门头等地与人一起，把地下党事先准备好的谷子，运到建岙米店。但是，要把稻谷舂成米，却没有工具。周飞一天到晚在外边工作，顾不上米店。钱珂芹去向村上群众借工具。开始时，钱珂芹不仅借不到工具，还听了不少的冷言冷语：“你们会开米店，为啥用具也买不起啊！？阿拉是勿借的”。“做生意勿象做生意的，老游勿象老游”。“……”她听了心里明白，郭青白的游击队，群众纪律极差，抢劫虏掠，鄞西群众称之“游吃队”“游劫队”。群众把自己也怀疑为游击队了。但是，做秘密工作不能暴露身份，也不便向他们多作解释，在这与伪顽斗争的复杂环境中，万一说了一句不妥当的话，敌人是会分析出她的身份的，后果将是难以想象，一时急得眼泪盈眶。她竭力抑住心中的痛苦，不让泪水流下来，又一户一户地去向群众恳求。

“恻隐之心，人人皆有”。这是善良人的共性，钱珂芹的哀求，引起了人们的同情，西头一个阿姆看到钱珂芹的焦急心情，也帮助她一块恳求，终于借到了舂米的工具。物主说：“这次你拿去用，米做好马上送回来，下次不要来借了”。她和钱爱琴化

了很大的劲，把稻谷做成米，开始营业。

做掩护机关秘密工作，不好公开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只好根据当地群众的实际和风俗习惯，与群众逐步建立感情。建岙村妇女家家户户编织草席。为了接近群众，和群众建立起深厚的友谊，钱珂芹和钱爱琴，抽空就向他们学习打席筋、织草席。人家孩子衣服、鞋袜破了，就主动帮助缝补。米店赚了钱，过节时买几条大黄鱼，煮熟，头尾留下和爱琴改善生活，把好的肉给四邻群众，一户分一碗，表示对自己帮助的谢意。邻居家庭闹纠纷，婆媳吵架，就积极帮助劝解，耐心细致的做双方工作，她在媳妇面前多说婆婆的好话，劝媳妇要尊敬婆婆，要听婆婆的话；在阿婆面前，多讲媳妇的优点：你媳妇整天织席子，又要做饭带孩子，够辛苦的，她有缺点和不对的地方，要耐心教育，不要骂”。

一次，钱珂芹找一个经常吵架的郑贵木妻子谈心。劝她要尊敬婆婆，说：“以后你自己也要做婆婆的，现在不尊敬婆婆，以后你做了婆婆，媳妇如不尊敬你，骂你，你心里好受不好受？”这些劝说，被在隔壁的贵木娘听到了。人比人，心比心，媳妇、婆婆都很高兴。从此，这对婆媳和睦了，贵木娘亲自跑到钱珂芹家里说：“阿芹啊，上次你向我借工具，我没借给你，急得你快要流泪，我现在想想真难过，对你不起，以后，你谷买来，要用什么工具，尽管来拿”。从此，贵木妈碰人就讲：阿芹真是个好人！”钱珂芹随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后，反动派疯狂搜捕共产党员及其子女的时刻，她冒险收留抚养钱珂芹的大女儿（当时只一岁半），时间长达8年。

钱珂芹对贫困群众不但同情，而且尽力帮助解决燃眉之急。一天，一个老太婆砍来一担柴，对钱珂芹说：“家里没有米”，要把柴卖给她换米吃。钱珂芹答应了，并且多给老太婆一些米。她高兴极了，村上有的困

难户没有钱买米，向钱珂芹赊米，她都赊给她们，这些困难户无米下锅暂时解决了，都很高兴，很多人成了党的积极分子。但是钱珂芹为了节省党的开支，自己生活非常节俭，可以省的都节省，一只面盆，早晚洗脸，烧饭时当锅盖，一物多用，周飞出去，晚上点灯只点一根灯芯。

一天下午，一个身穿长衫，肩背钱搭的商人走到米店对钱珂芹说：“老板娘，你们生意可好？我是向你们讨钱清帐来的，我的这笔谷钱可还清了吧！”钱珂芹一看是地委陈书记，忙回说：“王老板，周飞先生在楼上，楼下地方小，请上楼和他当面清算吧。”立即呼爱琴带陈洪到楼上和周飞谈工作。她一边做买卖，一边望风观察周围动静，提早打烊，借口天快黑了，要陈洪留宿，叫爱琴通知县委同志晚上七点正悄悄从后门进来开会。县委会开到半夜，钱珂芹和爱琴分别在前后门放哨，保护陈洪和县委同志的安全。

一九四三年夏，新四军浙东纵队三支队经常到鄞西活动，有时就在建岙宿营，支队长林达由通讯员陪来夜访“米店老板”，秘密与周飞商讨地方党和林大队如何同主力配合行动。一天中午，钱珂芹在溪坑洗衣服，和她在苏北一起工作、一起打埋伏的宋丹辉同志被派到三支队做医务工作，看见钱珂芹，她不知道钱珂芹在做秘密工作，战友重逢，热情地高喊：“珂芹，珂芹！”钱珂芹悄悄地向宋丹辉使了个眼色，头也不回默默地走开了，在旁的老百姓以为珂芹没听见，马上喊：“珂芹，部队女同志在叫你！”秘密工作的纪律，不允许她与共患难的战友在这特定的环境相认，她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为了党的伟大事业，在这突然造成的困境下，钱珂芹对旁边的老百姓解释说：“她认错了人”！宋丹辉看见钱珂芹的冷淡态度，开始惊呆了，但立刻领会，悻悻地走开了。

“九·五”事变前夕，米店关闭，县委

机天转移，在新四军浙东纵队和林大队配合袭击下，郭青白带部队越过鄞奉公路逃窜到宁海去后，鄞西除鄞江桥等少数伪军据点外，全部解放，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公开抗日根据地，钱珂芹结束了做秘密工作，先后任章水区委、鄞江区委组织委员兼民运工作，她发动妇女，组织妇女会，动员她们做军鞋慰劳前线，组织农会，搞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组织打猎队，保护农作物。

在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最激烈的紧张阶段，钱珂芹调到凤岙上陣村做民运工作，鄞奉县委为了避免和减少牺牲，决定除了少数同志仍坚持原地斗争外，大部分地方干部都集中到县大队一起打游击，有病、体弱，不能跟部队行动的，利用各种关系到宁波城里，或其他地方暂时隐蔽。当时，钱珂芹已怀孕好几个月，她自信自己在上陣村与群众关系好，不会出大的问题，坚持在上陣工作。一天晚上，她和一位坚持的女同志召开群众会，宣传形势，安定民心，鼓励斗志，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开会消息被在邻村的便衣队知道了，第二天一早反动派包围了上陣，要抓两个开会的女共产党员，钱珂芹为了不连累上陣村群众和住户老大娘，她向老大娘提出要跑到外边去躲避，老大娘死死不肯，把她作为从上海回来做产媳妇掩护下来。

徐婴同志被捕后，钱珂芹急于把消息赶快报告县委，对老大娘说：“我有急事要出去”。在一位老大爷的设法下，和她的侄子装做假夫妻到凤岙市去赶集，混出了敌人的封锁线，和黄建英同志汇合，把消息送给县委。

县委考虑钱珂芹快要生孩子，决定她暂时到宁波隐蔽埋伏，后又转到西郊石碶乡冯家张林湘、张晓湘家隐蔽。最后，转到慈南

徐鲍陈，一九四四年四月生下女儿周毅勤，满月后，就要求工作。

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胜利，钱珂芹回到章水区密岩，边工作边带孩子，和其他民运同志一起，恢复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培养发展了五、六个共产党员。

一九四五年春，钱珂芹到鲁迅学院学习，结业后，回鄞西做民运工作。不久，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了，根据朱总司令命令，周飞带领一些地方武装和民兵进击黄古林伪军据点，伪军、伪区公所人员逃入宁波城，缴获了敌人大批军用物资，粮食、银洋、金戒子等重要贵重物件。周飞的警卫员陈勇传带了一些给钱珂芹看。第二天，她和陈勇传、钱爱琴如数上交上级。

九月中旬，钱珂芹调到四明山最高点之一的茶壚做开辟工作。这是一个偏僻地少的山村，老百姓靠卖柴和开山种杂粮为生，离集镇远，交通十分不便，生活非常艰苦，钱珂芹经过调查，组织山民会，利用竹木资源多的优势，搞简单的竹木加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一天，她正在和村干部研究解决一位孤老太太生活困难的时候，突然通讯员送来紧急通知，立即到陆家埠集中，通讯员说：“首长交代今晚一定赶到”。钱珂芹和战友们在夜里越过高山陡岭，后半夜赶到了陆家埠。一位首长把钱珂芹叫进一间房子，向她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北撤的命令，说：“北方的生活很苦，你回家隐蔽坚持斗争，还是跟着北撤？”

钱珂芹毫不犹豫地回答：“生活艰苦不怕，我坚决要求跟着部队北撤”。当晚，钱珂芹编入北撤的干部队，留下了一岁半的女儿，第二天，跟着部队北撤，投入伟大的解放战争。

真正的优势在人民这一边

王元兴 肖林

抗日战争初，国民党反动派惧怕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武力，散布“抗战必亡国”的论调。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驳斥了这种谬论，指出：战争的胜败决定于战争的性质，正义战争必胜，不义战争必败，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实行人民战争，就能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最后击败帝国主义。八年抗战的历史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我们重温了一下抗日战争的历史，再一次学习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人民战争的伟大意义。

一九四二年，正是日本鬼子恣意蹂躏浙东人民的时候，我们参加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五支队。我们的部队活动在余姚、慈溪一带，当时由于浙东抗日武装力量是新建立的，所以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敌人数十倍于我们，武器装备也远远胜过我们，而且这时国民党顽固派，采取对日投降、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敌、伪、顽结成一体，集中力量来消灭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战力量。这就使得我们的斗争更为艰苦了。但由于我们所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人民与我们紧紧站在一起，同仇敌忾，同心同德，因此从表面上看起来，我们这支部队，数量很少，而实际上，在人力、物力和精神力量等方面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深厚泉源。我们跟群众真是血肉关系。人民群众随时都会向我们报告敌人的行动情况，使我们变成千里眼、顺风耳，相反的，群众把我们的行动却

封锁得很牢，一点也不让敌人知道，使敌人瞎碰乱撞。我们的米袋空了，人民群众就把自己的米拿出来替我们灌满。我们的侦察员出去侦察敌情的时候，群众往往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掩护我们，等等。所以我们部队的力量实在是不能以数字相计，这样的部队当然是无往不胜的。

一九四二年十月八日，我们所在的部队在三北阳觉殿与三百多个日本鬼子加上不少的伪军打了一个硬仗，这一仗中也可看出，只有真正的人民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当时，我们的武器和人数都处于劣势。早上七八点钟，日本鬼子和汉奸伪军，扛砲背枪，黑压压地过来了。鬼子确实是不大容易打的，他们不仅武器很精良，而且由于长期受军国主义教育的结果，骄横顽固，枪法也比我们这些刚穿上军装的农民好得多。但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这些，都不是战争的決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我们战士个个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明确为什么而战。大家都强烈仇恨日本强盗，战士们说，只要日本鬼子来了，不管他多么凶，也要拚命揍它、咬它、打死它。那次战斗，鬼子的火力虽然很猛烈，压得我们几乎抬不起头来，但同志们面无惧色，轻伤不下火线，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思想：狠狠揍，把鬼子阻击住、消灭光。

三北地区的国民党部队从未与日本鬼子打过什么仗，群众负屈忍辱已经多年，今天

他们看到自己的部队与这么多鬼子交锋，所以情绪特别激昂，他们也只有有一个想法，尽一切力量支援我们的部队，把鬼子消灭干净。附近的群众都参加了战斗，为我们积极搬运弹药，修筑工事，抢救伤员。战斗结束，我们一共打死打伤了七八十个鬼子兵，群众的高兴劲真是没法说，纷纷拾了猪、鸡蛋等物来慰劳部队。我们部队就是凭着这种勇敢的战斗作风，和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联的关系来制胜强暴的敌人。

敌人与我们恰恰相反，他们在人民群众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处处挨打，寸步难行。他们每隔三里五里设防，想以此控制人民群众，结果反而造成兵力分散，有利于人民群众抗敌。一九四三年，敌伪为了控制敌占区人民，封锁新四军游击区，从上虞的曹娥起，到慈北的观海卫止，处处筑起了竹篱笆或防护堤，并且派出了巡逻队，又封锁路口，群众出入都要良民证。敌人妄想用竹篱

笆了隔绝敌占区人民和新四军的联系，以乖乖地受它统治，并使它能够全力扫荡游击区。这真是敌人的痴心妄想。敌占区的人民在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运用各种形式，英勇地与敌人展开斗争。敌人费尽力气搞起的篱笆墙、防护堤，很快就给群众拆掉和捣毁了，敌人的检阅所和碉堡上，经常出现群众贴上去的抗目标语；单个出外的敌伪军常会“失踪”；当敌伪军扫荡游击区时，民兵就趁敌人后方空虚，积极活动，如火烧检阅所，拆篱笆，贴标语，夺敌人枪支，打小量敌人等，迫使外出扫荡的敌人回过头来进行防御。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支援了游击区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这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人民战争必胜，侵略战争必败。任何貌似强大的侵略者，在千百万站起来的人民面前，就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非被烧死不可。日本侵略者就是这样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忆抗日斗争二、三事

冯可法

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我父亲10岁时就在下三府（杭、嘉、湖地区）地主家做牧童，后来生黄胖病被赶出讨饭，讨到宁波学撑船为生。上无瓦片，下无插针之地，草房搭在坟摊里，冬无棉被夏无蚊帐，一年四季穿破衣，1936年为讨船钱被国民党警探队打重伤而死，全家生活更加艰难。为了活命，大妹九岁就去给人家做娘姨，经常挨骂受打，小妹四岁时活活饿死，大弟饿得头发都脱光，小弟弟因糠菜、野草充饥大便拉不出，我十三岁去做学徒。

宁波沦陷后，欺压老百姓的敌人更多了，有日本侵略军、汪伪和平军、汉奸卖国贼和国民党反动派、郭青白的游劫队以及各式各样的土匪部队，逼得老百姓无路可走，很多人妻离子散、逃荒要饭、冻死饿死人不计其数。在穷人生活这样困难的时候，还受到伪乡保长的敲诈勒索。他们狐假虎威，欺压百姓，苛捐杂税，手段极其毒辣。借抓壮丁为名敲诈穷人。一天，我从斗门桥做工回家，副乡长张云芳、保长沈才云带特务班在半夜踢开我家草门，来取热被窝。我缩着身装作矮人，母亲向他们讲好话求情，送给他们鸡蛋和鸡。他们见我家确实穷，榨不出油水，才放了我。

乡保长经常逼我们为敌人去挑夫，问他们为什么派我去，他们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家无钱，只好出力。1942年9月一天早晨，派我去挑东西到鄞江桥，说是有饭吃，还有工钱。我听了以为是真的，把早饭省下给妹妹吃，空着肚到乡公所。走

到乡公所又叫我到鄞江桥去。到了鄞江桥已是中午，肚子饿得很，排上队分来一市斤大麦米，生的不能吃，装好担子空肚挑，到樟村已走不动了，日本鬼子见我走得慢，用马鞭子打我。到王家车头，我实在吃不消了，人倒在地上，敌人用枪柄打得我不能动弹，以为我死了，把我担的东西分给别人挑。过一会，我醒过来，见敌已去远，支撑起身拖着伤痛返家，走到郑家向大娘讨茶喝。郑大娘见我这般光景，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是被日本鬼子打的。围拢来听的人都很同情，有的哭了起来，端出饭菜给我吃。我向大家告别，到建乔大妹家过夜，晚上，听到小学生唱歌声：

“河里的鱼儿要靠水来养，抗日的军队要靠老百姓来帮……”

我真盼望有这样的军队，我向建乔群众诉说日本鬼子的罪恶。农民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群众中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受日本人欺侮？国民党反动派不打日本侵略者，反而打自己人，这太不应该了。共产党、三五支队才是抗日爱民的军队。穷人要翻身，只有跟共产党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

我听了心里热呼呼的，就这样我参加了三五支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从游击战士到共产党员

我参加革命被分配到自卫队去当战士，分队长王阿林，是个大老粗，对战士很爱护，打仗很勇敢，教育我们要眼顾四方，看

清敌人，树立随时准备牺牲的精神。中队长叫毛尹，奉化人，是知识分子，有勇有谋，是我们敬爱的好领导。他事事、处处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关心同志，和我们跑路行军，教育我们为什么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关心老百姓的道理。他自己以身作则，带头执行。部队到达驻地，就去做群众的工作，了解战士伙食和同志们谈家常，了解战士思想和家庭经济、生活状况，晚上亲自检查岗哨和战士的床铺，给战士盖好棉被，离开宿营地，和战士一起送还借来的东西，打扫卫生等。在他的领导下，我学会了行军和打仗。初入伍时，我们行军一般都在夜里，一夜走二、三十里，脚走起了泡，痛得很，毛中队长教我们用热水洗脚。固然，第二天、三天就不痛了。以后成了习惯，不但脚不痛，也不起泡了，而且也不知吃力了。有少数同志患鸡盲眼，夜行军常跌倒，毛中队长总要亲自过问，把跌倒同志扶起，休息一下再走，跌伤了的安排在群众家里休息养伤。因此，我们都很敬爱毛中队长。今年他已86岁高龄了，我仍挂念这位尊敬的老首长。

我们抗日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保卫党、保护老百姓。宁波沦陷初期，敌强我弱，我们不能硬拼，开展游击战，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采取敌少我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和“集中兵力打死灭战”的办法与敌人开展武装斗争。敌人天天想消灭我们，我们用游击战与敌人周旋，敌追我到东，我避敌到西，与敌开展捉迷藏。敌人追我次数多了，来个将计就计，叫他们自己打自己。如国民党杂牌军部队88团和89团，经常跟踪我们，妄图消灭我们。一天来了一批国民党浙江保安团，我们借机把88团引向浙江保安团驻地附近的赤水乌坑，半夜后，我们三个班，每班一路，占领三个山头，按规定的时间，先向浙江保安团发起攻击，后又向88团发动攻击。

打了一阵，我们迅速返还驻地，敌人听到枪声，惊慌失措，立即吹哨紧急集合，我们隐蔽山上，听到敌人“快！快！快”的催促声音和“妈拉皮”的骂声，88团和浙江保安团都互相射击，都把对方误为是我们游击队，从后半夜打到凌晨。在敌人自相残杀时，我们却到重要道口——相量岗埋伏，打88团的尾巴，缴来长短枪30多枝，活捉俘虏10多人，打死打伤30多人，88团团长沙胡子（岫山）只好夹着尾巴逃窜。从此后，不敢再来侵犯我们了。

抗战时期，四明山地区有好几股土匪。我们在夜行军中也经常碰到土匪的活动。有一次行军中，2位尖兵遇到小雄鸡股匪，他们问“那一个？”我们回答：“老百姓”。我军立即卧倒，架起机枪，向土匪发起攻击，同时向土匪开展政治教育，宣传“优待俘虏和缴枪不杀”政策。有几个土匪举起枪投降了。他们说：“我们原是老百姓，被拉夫后强迫充当土匪的，不服从要杀头……”经过我们教育，把抢来的一部分东西分给他们，作回家生活和生产费用，都已遣散回家。

在和敌伪军、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军队的斗争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一天天地壮大，我们由原来的自卫队发展成区中队和鄞奉县大队。武器装备也由土枪、独粒弹、漏底枪等旧式武器，改换成七九、矮中正、三八式步枪、手榴弹及机枪。在党的教导下，我们认识也逐步提高，把自己一切交给了党。1943年3月，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

毛中队长（鄞江区区长）非常关心我家生活，他知道我家劳动力缺乏，经济很困难，安排我做地方工作，他对我说：做地方工作也是革命工作，你是梅园乡人，地熟人熟，有利开展工作，又可照顾家庭。1943年下半年，我接到中共鄞奉县委通知，到密岩

祝家佛堂训练班学习。后被分配到梅园乡抗日民主政府工作，在反顽自卫战争中，坚持在梅园乡工作，乡公所牌子挂在马家祠堂门口，有情况，拿下牌子藏起来。我们白天各自搞生产，夜里分村串户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开展减租减息，组织农会、民兵、妇女会、动员青年农民参军，收集敌人情报，送给上级组织。

当时，我家住在梅园乡岳官漕村后的坟堆里的一座草房，背后是山，面是平原，是敌伪顽来往的交通要道，我们眼睛盯着蜃蛟、耳朵听着鄞江、凤岙敌人的动静，做好党和部队的耳目，发现敌情，及时向组织报告，有时一天要送两次情报，任务紧急时，不管白天黑夜都要把情报迅速送给组织，紧急时人手不够，叫我弟弟帮助送。

在乡里，我们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当时党员是不公开的。我们这些人拿起枪来打仗就是兵。放下武器，拿起锄种田就是民。在敌伪顽猖狂时候，我村保长没人当，村里选翁纪友当保长，每月给300斤谷当工钱。他原是个无业游民，当上保长与我很接近，遇事虚心与我商量，我对他们进行教育，他对我说：“今后不搓麻将了，要好好为村民做点事情。”我说：“你真能不赌，当个好保长，我给你向领导汇报，在报纸上表扬你。”过几天，鄞江区委书记舒文同志来，听了我的汇报，不几天，新浙东报头版刊载“模范保长禁止赌博的消息。”翁受了表扬很高兴，我就利用他为我们收集和传送情报，为抗日救国工作。

寻找三五支队

徐友祥

我家在宁波，一家三口全靠父亲做泥水匠勉强维持。没有活干时，还要饿肚子，母亲只得给人家去做娘姨赚来替补。我12岁，父亲病故，家里生活更困难，为了我活路，母亲托人把我送进高桥孤儿院。第二年她又去世，我真成了没有父母的孤儿。

孤儿院是基督教会办的慈善机构，外人总认为生活不错的，实其孤儿院孤儿的生活是很苦的。孤儿院200多人吃饭，都是年龄较大的孤儿烧的，天未亮就起床烧粥、烧水，燃料是砵糠，用风箱鼓风，一只手拉风箱，一只手向灶门内加砵糠，两锅粥烧熟和水烧热，汗水满面，烟灰熏得象挖煤工人，满脸乌黑。

孤儿院有300多亩田，技术农活由作头做，放牛、割草、车水、插秧、耘田、割稻、晒谷等农活，都由孤儿做。放牛是比较轻的农活，牛肚必须喂饱，不饱挨骂，还罚割草二蒲篮。管教我们的先生和作头，吃饭另起小灶，白米饭、小菜鱼、肉常见，有时还加更好的菜，我们见了直流口水。我们吃的是粥和青菜淡饭，还填不饱肚子，三餐见饭桶来，就围着抢饭，不然就少吃。有病无处医，一天我发高烧，一人睡着就无人过问。

逢星期天，我们要到高桥或集仕港礼拜堂去做礼拜，孤儿院为了给社会上有好的影响，给我们穿着兰布罩衫、裤，回到院里马上脱掉。宁波沦陷后，有时去宁波城里做礼拜，过西门板桥头，要向岗亭里的鬼子行礼，不行礼要遭鬼子打骂，一次见到一个山

民没有向鬼子行礼，被打倒在地上打滚。我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孤儿院附近有抗日游击队宣传抗日救国，给我萌发了参加抗日救国的思想。孤儿院规定，年到16岁的孤儿，介绍到工厂、商店去做学徒。宁波沦陷，厂商老板纷纷逃难，比我大的孤儿大部份被迫去当伪军，为侵略者卖命，打自己人，孤儿院“先生”对我们的生活更刻薄了，我和八个孤儿联合起来，夜里闹了他们的宿舍。

1943年7月一天夜里，我们八人逃出孤儿院，向山里去找游击队，当时游击队很多，有真抗日游击队，有挂抗日牌子扰名害名的游击队，还有伪乡公所便衣队，我们分不清楚。到大隐打听抗日游击队，群众纷纷围拢，知道我们是从孤儿院逃出来，一位好人告诉我们：“你们到翁岩去，那里有三五支队活动。”

到了翁岩，我们向村民说要找三五支队，一位着便衣的人得知我们是从孤儿院里逃出来的，已经一天没吃饭了，就安排我们吃住。当夜，在翁岩靠溪坑边毛阿祥屋里过宿，第二天，领我们到红岭村，见到穿灰色军装的军队，村人告诉我们这是三五支队教导大队。

“三五支队找到了”，我们都很高兴，过了七天，我们被分配到部队去工作，原分配我到梁弄横坎头司令部当号兵，因牙齿不齐，分配到后方医院当勤务员，走上了革命道路。